

核心话题

警惕互联网消费金融过快发展对居民有效需求的挤占

近年来,借贷消费越来越普遍,正在逐渐成为居民日常消费的一种重要途径,且早已不再局限于住房和汽车等大宗消费,手机、相机甚至一些日常消费品都可以轻松通过消费贷款的方式消费。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居民消费性贷款余额增速连续多年保持在两位数高速增长区间,截至2020年11月,我国境内居民消费贷款余额已达49.1万亿元。在10年前的2010年,这一数字仅为7.51万亿元。

当然,说到消费贷款就不能不提互联网消费贷款和互联网金融业务,虽然目前权威机构没有对这部分总体规模有确切的数字,但毫无疑问的是,近年来互联网消费贷款和互联网金融业务呈现爆发式的增长。

经常通过网络购物的消费者一定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各大平台在近年来都陆续推出了自己的消费金融业务,消费者在结算时各大平台往往会将默认支付设成自己的消费金融业务,对首次开通给予较大的优惠,等到消费者开通后平台又会鼓励消费者办理消费分期,并对首次分期的消费者给予利息上的大幅优惠,有的甚至给予首次分期

文/范欣



作者为财经评论员

表面上看,这对居民短期消费形成了较大的促进作用,但如深入分析,这样的借贷式消费其实是存在很大问题的,对青年人和整个社会都是有深远影响的。

的免息优惠。还有,各大平台均有自己的借款业务,且开始时都非常“慷慨”地给予借款者额度,借款的流程也非常简便,填写身份证和手机号随即放款。

一时间,互联网消费贷款和互联网金融业务遍地开花。表面上看,这对居民短期消费形成了较大的促进作用,一些消费者特别是年轻消费者可以通过办理这些业务顺利购买本来买不起或需要攒几个月钱才能买得起的手机、电脑、潮牌服装鞋

帽甚至奢侈品,满足短期的消费欲望,但如深入分析,这样的借贷式消费其实是存在很大问题的,对青年人和整个社会都是有深远影响的。

从借贷式消费的主体看,大部分是未参加工作或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这部分人喜欢追求潮流,很容易在荷尔蒙的作用下产生冲动消费,但受自身收入有限的困扰,他们无法满足自身的消费欲望。互联网消费贷款和互联网金融业务给了他们实现即刻消费的可能。本来上万元的高档手机或其他奢侈品通过借贷消费每月仅需花费较少的钱就可及时拥有,表面上看十分划算。是否还记得当年一个孩子卖肾买苹果手机案例,如果当年有借贷式消费途径,他大概率就不用卖肾了。但一旦“入坑”,培养出这样的借贷消费习惯并日积月累后,很大概率会出现每月生活费一到账就都用来还各种贷款的局面,最后每月所剩生活费都会寥寥无几。更有甚者,因还不起消费贷款而不得不借更多消费贷还款,债务雪球也因此越滚越大,最后发展到借贷者无法控制的局面。此时各大

平台的大数据催收就派上用场,最终结果大概率是由年轻人家长一次性承担了这部分费用,也有部分年轻人因此走了极端,近年来这方面的新闻报道已有不少,需要引起全社会的注意。

从互联网消费贷款和互联网金融业务本身的利率看,普遍是大幅高于普通商业银行贷款的,2020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新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给出的民间借贷利率上限为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4倍,最新一年期LPR为3.85%,也就是说民间借贷利率最高为15.4%。在此之前,互联网消费贷款和互联网金融业务利率更高。试想,如此高利率的资金是谁在借贷,正常有一定收入水平的居民在有借贷需求时完全可以根据收入证明在银行办理信用贷或消费贷业务,额度一般足够正常消费使用,对应利率一般在5%~8%的正常水平,这些居民肯定不是互联网消费贷款和互联网金融业务的目标客户。只有那些收入有限又无法从正常渠道取得贷款

的,购买高档商品又会选择分期的人才他们真正的目标客户。更进一步,近段时间一些平台陆续推出了很多较为低俗、以社会底层为目标群体的、吸人眼球的借贷广告,说明他们已将目标群体由青年人向社会底层渗透,这必须引起监管层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此外,虽然借贷消费短时间是可促进整体消费规模提升的,但如果借贷消费规模短期持续快速提升并在青年人中形成过度超前消费的习惯,那么不仅会抛弃国人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更会大幅透支居民未来的正常消费能力,长远看对居民正常消费需求的稳步合理释放、形成需求牵引供给的良性格局是弊大于利的。

因而,未来一个阶段需要从多个方面形成联动,及时扭转互联网消费贷款和互联网金融业务过快扩张的问题。

一方面,需加强对年轻人树立正确的消费观的教育,年轻人应根据自身收入水平适度消费。在这点上,不仅需要家长们多与年轻人沟通,更需要媒体、学校、借贷平台等多方面和多维

度的共同努力,媒体多宣传一些正确的消费理念,学校加强对学生的消费引导,减少学生间的消费攀比,借贷平台少推出一些有针对性的诱导性广告。另一方面,则需加强对从事互联网消费贷款、互联网金融业务的监管,2020年以来相关部门已出台如民间借贷利率上限、单户贷款金额限制等有针对性政策,未来还可提高监管要求,比如对各类贷款平台出台类似于银行业监管的统一政策,要求平台放款时不仅对借款者收入进行综合评估,还应考虑借款人在其他平台的借款记录或总负债情况,防止借贷者进入所谓的“债务陷阱”。未来还应建立全面的消费金融法律体系实行统一监管,将各类平台公司统一纳入征信体系。

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注重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加强互联网消费贷款和互联网金融业务的规范管理不仅有利于需求侧管理,更是促进居民未来消费需求合理释放、带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

囊中江湖

租房落户、户籍互认,让人口竞争摆脱“内卷化”

户籍改革又有新进展。近段时间以来,包括广州、福州、青岛等在内的多个大城市密集推出户籍改革政策,放宽落户门槛。最新一例是苏州。2020年12月22日,苏州市发布《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推动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落实租赁房屋常住人口在社区公共户落户政策,经房屋所有权人同意可以在房屋所在地落户,也可以在房屋所在地的社区落户,破除隐形门槛。创新户口迁移政策。实施省内特大城市苏州与南京在积分落户时,实现居住证年限和社保年限互认。探索苏州与无锡、常州等具备条件的都市圈率先实现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互认。

所谓“形势比人强”,近几年户籍政策的松动就是一个典型范例。从前两年一批二线城市之间上演的以学历落户为主要手段的“抢人大战”,到2020年广州、上海等部分一线城市不同程度下调落户门槛,再到苏州、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宣布居住证年限和社保年限互认,户

文/宋昌俊



作者为媒体评论员

在前一阶段以学历落户为主要特征的户籍改革基础上,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户籍政策松绑或者说各城市之间的人口竞争,将呈现出两个主要特征。

籍政策松绑仍在不断推进,除了极个别城市,已经鲜有例外。

当然,表面上是势如破竹的户籍政策松绑,实际则是各大城市对存量时代的人口竞争作出的现实回应。一方面,2015年以来,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已经逐年下降,这意味着即便是那些长期以来的人口净流入城市,也不得不面临人口流动天花板不断降低的现实;另一方面,2019年中

国人口出生率再创新低,社会老龄化程度继续加深,人口红利的式微已经让各大城市感受到了压力。颇为巧合的是,这次在降低落户门槛上有多重突破的苏州所在的长三角地区,正是全国“最老地区”之一。

总的看来,在前一阶段以学历落户为主要特征的户籍改革基础上,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户籍政策松绑或者说各城市之间的人口竞争,将呈现出两个主要特征。

一是,从“抢人才”向“抢人”转变。此前各城市的“学历落户”,大多都是要求本科以上学历,虽然这与前些年不少城市的人才政策相比已经明显打开了更大的口子,但毕竟有学历这道硬杠杠,比如它把农民工群体就基本排除在外。这一模式对绝大多数城市来说,注定不可持续。且不说多数城市能够吸引的“人才”其实很有限,从正常的人力资源发展的角度来看,也没有哪座城市可以说完全建立在“高学历”人群的基础之上。

此一背景下,石家庄、南昌、昆明等多座省会城市宣布“零门

槛”落户,实际是大势所趋。尤其是最近作为东部发达地区省会城市的福州也加入这一行列,更是具有风向标意义。完全可以期待,未来将有更多的城市跟进。这预示着城市的人口竞争,正式从前一阶段的“抢人才”迈向“抢人”。

二是,更加注重本地或省内的农业人口转化。长期以来,说到“抢人”,似乎都默认是一个地方对另一个地方的人口争夺,但其实对绝大多数地方来说,城镇化人口的增量主要还是来自本地农业人口的转移。苏州市这次提出“租房可落户”,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挖掘本地的常住人口存量,使部分租房人群更便利地转化为市民人口。

此外,《意见》还明确指出,优先解决好城镇就业、居住5年以上和举家迁徙的农业转移人口,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的落户问题。这一点虽然是国家发改委的明确要求,但像苏州这种城镇化率本来就高的特大城市也率先响应,无疑更具有示范意义。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一些大城市,将更受触动。

当然,不管是“抢人才”走向“抢人”,还是加快农村人口向市民化人口的转移,体现的都是存量时代的人口竞争要求。它的好处显而易见,那就是如今的城镇化将更普惠。而由此加速的“人口进城”步伐,也有利于扩大消费和内需,最大限度激发被抑制的人口存量红利。按照顶层设计的说法,这是促进包括人口在内的生产要素的高效配置,套用眼下时髦的话说,是让人口竞争摆脱“内卷化”。

不过,当落户门槛不断降低,尤其是一批省会城市也纷纷开启“零门槛”落户模式,还是有人担心,这是否意味着大城市将无限扩张,进一步虹吸中小城市?对这个问题,苏州与南京实现居住证年限和社保年限互认,苏、锡、常等具备条件的都市圈率先实现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互认,以及广州对不同区域实行差别化落户政策,其实都给出了行动上的回应。那就是,在大城市落户门槛普遍松动的情况下,人口流动将主要流向都市圈,而非单纯的中心城市。

这方面其实是有顶层设计

层面的引导的。如2020年上半年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提出,推动超大、特大城市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探索推动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率先实现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通俗地说,就是要通过破除城市群内部的户籍壁垒来实现人口的合理流动和分配,避免大中城市过度失衡。这也与前不久《求是》杂志刊发的权威文章中的定调形成了呼应——东部等人口密集地区,要优化城市群内部空间结构,合理控制大城市规模,不能盲目“摊大饼”。

曾经艰难推进的户籍改革,在新的人口和经济发展形势下却悄然“破冰”,这是时间的力量,也是大势的力量。而落户门槛不断降低,如何保障新市民人口享受到同等的市民化待遇,城市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如何满足不断提高的社会期待,这些也还需要有同步的制度和资源保障。这关系到新一轮城镇化的质量,也影响到人们进城的积极性。

自由谈

逃离“996”,个人、企业和法律都应有所作为

一名年轻员工的猝死,让“996”“加班文化”再上热搜。所谓“996”,就是指工作时间从早9点到晚9点,一周上6天班,且没有补贴或者加班费,也不允许请假。

对很多人来说,都有感同身受的“内卷感”。生活在一个“亚历山大”的社会,被各式各样的“社会焦虑”所裹挟与包围,每个人身在其中,都不可避免地“内卷”。“996”不只是暂时的折磨,更是当代人的生存处境。

缘于此,“996”近年来也是非常热门的词汇,2019年12月2日,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发布了“2019年度十大网络用语”,“996”位列其中;同一日,该词还入选了《咬文嚼字》杂志评选出来的“2019年十大流行语”。“996”之所以火热,是因为其不仅是互联网行业的常态,也是很多“打工人”的工作习惯。很多现实就是如此: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从法律的角度来说,“996”

文/杨燕明



作者为媒体评论员

“996”从来都不是奋斗的代名词,它涉及到法律、利益等方面的问题。对于这样的事情,个人需要幡然醒悟,企业需要算好长远账,法律也肯定不能坐视不管。

本身就是违法之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章第三十六条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同时,第四章第四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

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一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此外,这部法律还规定,“企业因生产特点不能实行本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条规定的,经劳动行政部门批准,可以实行其他工作和休息办法。”

法律的规定细致入微,对劳动者的保护无微不至。只可惜,法律是丰满的,现实却是骨感的。在现实的操作与执行中,很多劳动者与自己达成了“和解”,对现实作出了妥协。而这,也让很多公司有恃无恐,甚至不以“996”为耻,反而以此为荣,完全颠倒是非、扭曲了价值观。也因为这样,大众对“996”深恶痛绝,但却鲜有人能站出来反抗。有时候,现实就是如此无奈与无力。

这一点,数据统计或许就是最有力的证据。据北京师范大学一位研究员2016年估计,“中

国在职员工平均每年工作2000~2200个小时。”而根据经合组织的统计,这一数字远高于美国(每年1790小时)、荷兰(1419小时)、德国(1371小时),甚至日本(1719小时)。这意味着,加班文化、“996”人早已成了一道苍凉的都市表情了。

“996”文化的无孔不入,也带来了很多的现实问题。“上班‘996’,生病ICU”不只是一种诙谐的调侃,更是现实无奈的写照。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杰弗瑞·费弗就在《工作致死》一书中直言,“人们正在因为工作而送命,工作是导致人们死亡的第五大原因(高于肾病和阿尔茨海默症)。”费弗估计,“由于工作压力致死的美国人每年多达12万人,全球达100万人。”虽然只是预估,但加班文化引发的问题绝非危言耸听,的确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事实上,“996”工作制不只是一种畸形的企业文化,也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行为,因为其根本无法带来实际收益。斯坦

福大学的一份研究发现,“每周工作超过50小时后,员工的产出会大幅下降,超过56小时则会急剧萎缩。”这意味着,所谓的“996”,很多时候可能只是在消耗时间,因为超强的工作强度、超长的工作时间,并不会给企业带来任何的效益与价值。这样的“现实账”对各大企业来说,的确需要好好地算一算。盲目地追求“时间的叠加”,绝非最优方案,刺激与提升员工的工作效率,建立起更加科学与正确的企业文化,才是王道。

除了企业要算好账之外,对年轻人、劳动者而言,除了工作之外,同样应该有“诗和远方”。日本著名经济评论家大前研一在《低欲望社会》一书中写道:“我们应该藉此废除一种根本性的规则,得以诞生一种自由的学习方式,自由的工作方式,自由的劳动方式,自由的赚钱方式和自由的生存方式。”随着社会向前发展,随着人们意识的苏醒,这样的一种新方式,应该慢慢地被更多人

所信仰,以此逃离那个被“996”包围的世界。

“996”从来都不是奋斗的代名词,它涉及到法律、利益等方面的问题。对于这样的事情,个人需要幡然醒悟,企业需要算好长远账,法律也肯定不能坐视不管,对于一些企业严重的违法之举,或许也可以考虑提起公诉,用法律给“打工人”撑腰,最大限度地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比起升职,还是朝九晚六吃小笼包比较幸福了”“我们不为公司存在,而是公司为我们存在”“身体是自己的,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为何要把健康葬送在工作上”“不要做那种一心扑在工作上的人,要学会享受生活,认识不同的人,拓宽自己的眼界”……2019年走红的日剧《我要准时下班》爆出了很多金句,俘获与触动了许多观众的心。我们也在未来的某一天,“准时下班拒绝加班”不只是电视剧里面霸气的镜头,而是我们触手可及的幸福。